

地緣風險的認知作戰：論媒體的宣教者角色^{*}

李世暉^{**}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教授

摘要

今日國際社會中，政府對於地緣政治下安全風險的認知，決定了國家之間的競爭關係，最終是走向和平還是戰爭？而在此類地緣風險的認知作戰下，媒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媒體在戰爭上扮演的角色分為資訊控制下的「唱和者」、愛國主義下的「啦啦隊」，以及反對衝突戰爭的「對抗者」。本研究以 1930 年代中期至 1940 年代中期，提倡日本地緣政治的小牧實繁為分析物件，探討其地緣思維形成、轉變、與媒體之間的互動，以及後續帶來的影響等。結論指出，在論及媒體與戰爭的關係時，不可忽略傳播媒體在地緣風險中倡議與噤聲特定觀點的「宣教者」角色，即以地緣政治來闡述並宣揚國家利益，進而影響國民的世界觀，以及國家、社會對於戰爭的認知。

關鍵字：小牧實繁、日本、地緣政治、媒體與戰爭

* 本論文在思考與撰寫過程中，特別感謝兩位審查委員的寶貴建議，以及編輯團隊的細心核校。

** E-mail: riseiki@gmail.com

投稿日期：2023 年 03 月 27 日；接受日期：2023 年 05 月 01 日

壹、前言

戰爭（war）一詞的語源，「可追溯到古德意志語（old high German）的 *werra*，原意是指紛爭」（上野貴史，2016，頁 25）。在近代語詞的使用習慣上，戰爭可分為國際法上的意涵，以及軍事上的意涵。前者是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武力衝突狀態（喜多悅子，2005），在形式上又可區分為「正式宣戰至講和」的狀態，以及並未宣戰而逕入至「實質武力衝突」的狀態；後者則是指以軍事力量（軍隊）進行武裝鬥爭的狀態，其目的是屈服敵人、貫徹我方意志的武力行使（Clausewitz, 1976）。此一軍事上的意涵，並非限定國家為戰爭行為主體，軍事武裝集團、組織所遂行的武力紛爭，例如內戰（civil war）、獨立戰爭（wars of independence）等，也被歸類為戰爭的一種型態。

進入到 20 世紀之後，戰爭一詞指涉的內容逐漸複雜化；許多非軍事領域的嚴重衝突，也使用戰爭一詞。例如，涉及意識形態與價值觀衝突的「文化戰爭」、涉及國家間經貿利益競爭的「貿易戰爭」、涉及科學技術研發與應用對抗的「科技戰爭」等。即便戰爭一詞不再專門指涉國家之間的武力衝突狀態，但在一般使用上，無論是文化戰爭、貿易戰爭或是科技戰爭，經常會被視為國家間武力衝突的前兆。而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因文化、貿易衝突（戰爭）而引發全面武力衝突的歷史事件，所在多有。如十字軍東征（1096 年至 1303 年）、三十年戰爭（1618 年至 164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年至 1918 年）等。

另一方面，國家遂行戰爭的動機，國際政治學領域主要是透過「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概念來理解。在現代民族國家興起之前，國家利益的概念經常被化約為「君王意志」或「王朝存續」。當民族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彼此頻繁互動之後，國家利益開始被視為與國家生存發展密切相關的國家價值（李世暉，2017）。因此，「國家外交政策的第一要務，即是以增進國家利益為目的」（高阪正堯，1991 年，頁 2）。換言之，主導國家行為的關鍵因素，即是國家利益。

然而，國際政治領域中的國家利益概念，是一個重要但內容相對模糊的概念。所謂的「與生存發展密切有關的價值」，其指涉的主體究竟是國家、政府還是國民？國際政治對此一價值主體的見解差異，形成強調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realism），以及追求國民利益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現實主義主張，包括戰爭在內之任何增強國家權力的政策都符合國家利益。自由主義

認為，透過合作來維持國際社會的和平，才同時符合國民與國家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由人民所組成；而由此延伸出的民族、民族屬性與國族主義等概念，是在民族國家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特殊的文化人造物」（Anderson, 2006, p. 40）。這些人造物在 18 世紀末出現，是各種獨立的歷史力量複雜交會下，自發地淬煉出來的結果。在形態呈現上，此一人造物可以被移植到多元的社會領域，吸納各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組合。如果說民族／國族（nation）是一個政治性的「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這些想像社群的共同利益，也只能是一種「想像利益」（imagined interest）（李世暉，2017）。無論是民族還是國族，其在邊界（boundaries）所呈現的認知與認同現象，是觀察民族／國族內部互動與外部互動過程的指標。其中，主觀的心理邊界涉及對外的異己感（the sense of otherness），以及對內的根基情感聯繫（the primordial attachment）（王明珂，1997）。而客觀的物理邊界則是涉及國家主權獨立、國家領土完整等與地理息息相關的概念。

上述的地理區隔、「我族」（we-group）與「他族」（they-group）區別、想像利益的認知／認同，在 19 世紀時逐漸匯流成「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概念。最初的地緣政治，是將國家視為地理有機體或一空間現象，著重探討地理與應用政治學之間相互關係的科學（藤沢親雄，1925）。透過媒體的出版、傳播，強調國家尋求權力的地理因素，以及分析國家生存與地理環境關係的論點，包括美國海軍將領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的「海權論」，英國學者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 1861-1947）的「陸權論」、德國學者豪斯霍夫（Karl E. Haushofer, 1869-1946）的「生存圈」，快速地成為當時主要國家制訂戰略時的重要基礎。由此，對於國家所處地理位置的思考，也轉變為國家的地緣戰略思維。

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即是一個明顯的案例。明治維新時期建立國家概念最重要的措施，是確定新國家的領土疆域。經過數年的交涉，日本以庫頁島向俄羅斯換取對千島群島的支配權，同時將原本英美控制的小笠原群島，以及屬於中國勢力範圍的琉球，劃歸明治國家的領土（李世暉，2016）。之後，日本在海權論、生存圈的影響下，一方面確立其建軍制海的國策方針，另一方面則發展出主權線與利益線的思維，進而走向太平洋戰爭。

受到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屬於研究論述的地緣政治，戰後一度被視為國家發動戰爭的理論基礎而受到批判。即便如此，戰後的國際政治依然無法擺脫地緣政治的影響，只是將武力衝突的戰爭概念轉變成國家安全的概念。

而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仍然是國家思考其利益對象，確認其威脅來源，實行其對應策略的主要依據¹。然而，屬於理論層面的地緣政治，並非推動戰爭的主要因素；統治階層如何認知國家所處的地緣風險，以及如何思考因應策略，才是決定戰爭與否的關鍵。

透過上述的脈絡可以得知，國家／政府對於地緣政治下安全風險的認知，決定了國家之間的競爭最終是走向和平還是戰爭。舉例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主要原因之一是德國尋求地理上的生存圈而走向擴張主義。在接續併吞奧地利與捷克之後，德國為了在未來可能的戰爭中取得優勢，乃於 1939 年 9 月 1 日進攻波蘭，進而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的大規模總動員式的戰爭，參戰各國除了武裝其軍事力量之外，也透過各種媒體「批判侵略戰爭」或「合理化戰爭」，以取得總力戰格局下的國民支持，進而贏得戰爭的勝利。

從這個角度來說，媒體所傳遞的地緣政治思維，既是發動戰爭時的理論背景，亦是合理化戰爭的思想依據。然而，地緣政治思維透過何種管道傳遞至國家的統治階層？國家的統治階層又是如何據此認知國家的地緣風險？而此一地緣政治的認知又是如何推動國家走向戰爭？這些問題，過去的研究鮮少著墨。有鑑於此，本論文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日本作為對象，探討日本的地緣認知，如何逐步把日本推向戰爭邊緣。同時，藉由分析代表性學者小牧實繁（1898-1990）的地緣思維形成、轉變，其與媒體之間的互動以及所帶來的影響，重新思考地緣政治、媒體與戰爭之間的關係。

貳、文獻探討

一般在論述媒體與戰爭的關係時，經常會從「魔彈理論」（hypodermic needle model）切入。魔彈理論緣起於 1920 年代，結合行為心理學、大眾心理學的論點，主張特定資訊可透過媒介，如同將魔彈打入大腦般地直接改變受眾的認知。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納粹德國，以及大日本帝國透過報紙、廣播媒體對國民進行戰爭宣傳，被認為是最明顯的例子（佐藤卓己，2022）。

1 針對安全保障，日本國際政治學者田中明彥認為，可將其意涵聚焦在保障的物件、針對的威脅與實行的政策工具等三項議題上。首先是安全保障的物件，如何從重視國家、國土與主權，轉變強調國民、經濟與文化。其次是对威脅的認定，如何從傳統的軍事、外交等威脅，轉變成非傳統的貿易、金融、能源、恐怖主義、跨國犯罪、全球環境變遷等威脅。最後是安全保障的政策工具，如何從過去強調軍事武力的硬實力（hard power），轉變成兼顧以經濟、文化影響為主的軟實力（soft power）（田中明彥，1997）。

而由此衍生出關於「政治宣傳」(political propaganda)理論，廣泛被用來分析現代國家，特別是共產極權國家中政治與媒體之間的關係。

另一種關於媒體與戰爭的研究途徑，主要是透過文學的角度進行理解。古代文學對於戰爭的描述，主要是以旁觀者的角度論述戰爭英雄。拿破崙戰爭之後，文學成為國家制度的一部分，文學與文學家被開始捲入國家之間的武力衝突，也就是戰爭(西川長夫，2002)。近代的戰爭文學，受到作者所處的國家社會情境與個人經歷的影響，既有反對戰爭的文學作品，也存在讚揚戰爭的作品²。

此外，媒體傳達戰爭訊息的方式，也是觀察媒體與戰爭關係的重要視角。一般而言，當媒體報導戰爭訊息時有三種態度，分別是站在監督立場的批判觀察者(critical observer)、協助政府的宣傳公關者(publicist)，以及捲入意識形態與話語權的「戰場」(battleground)(Thussu & Freedman, 2003)。如果將文學視為媒體內容的一部分，結合前述媒體與戰爭關係的論述脈絡，通常可以從三個觀點來厘清現代媒體與戰爭的關係。

第一，媒體是資訊控制下的「唱和者」(sympathizer)。19世紀之後，戰爭型態逐漸從原本的限定的、部分動員的武裝衝突，轉為全面的、總動員的國家衝突。影響所及，戰爭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活動，以及與國家、國民相關的資訊，都因為戰爭的需要而受到國家／政府的控制。在資訊控制下，國家／政府一方面透過法律限制媒體的報導內容，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媒體傳遞有利戰爭進行的特定訊息。在此情境下，媒體無法違逆限制與操控資訊的國家／政府(Wyatt, 1995)。只能被動獲得政府給的資訊，且查證能力受到法律限制的媒體，在戰爭時期容易成為戰爭的「唱和者」，宣傳特定觀點。

第二，媒體是愛國主義下的「啦啦隊」(rooter)。當國家處於戰爭的情境時，一定期間內會出現社會輿論對國家領導人的高度支持現象，也稱之為「聚旗效應」(rally-round-the-flag effect)(Mueller, 1973, p. 208)。此時，媒體通常會最先感受到國內高漲的愛國氛圍，一邊扮演政府的呼應者與唱和者角色，一邊則是引導輿論朝向支持戰爭的論述發展(藤田博司，2004)。值得注意的是，資本主義下的媒體在扮演啦啦隊的角色時，並非完全受到愛國

2 例如，針對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櫻井忠溫(1879-1965)的《肉弾一旅順実戦記》(出版於1906年)與水野廣德(1875-1945)的《此一戰》(出版於1911年)，屬於強調武勇與美化戰爭的文學作品；而與謝野晶子(1878-1942)的「君死にたまふことなかれ」(出版於1904年，詩歌)與大塚楠緒子(1875-1910)的「お百度詣」(出版於1905年，詩歌)，則是屬於描寫戰爭悲慘面的反戰文學作品。

主義的趨勢，有時也是市場考慮下的選擇。例如，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報紙透過版面與標題的安排，擴大渲染戰況的理由，主要便是市場考慮。《朝日新聞》在 1931 年發生「九一八事變」（日本稱之為「滿州事變」）時，透過社論呼籲各方須避免全面衝突。而採取此一立場的《朝日新聞》，1931 年的發行為 143.5 萬份，較上一年度減少約 15 萬份。但隨著九一八事變的擴大，《朝日新聞》的報導態度從克制轉為支持。不僅購置 5 架飛機進行事變現場的即時報導，也增加報紙新聞的篇幅。而《朝日新聞》的發行份數在 1932 年增加至 182.4 萬份，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 1941 年，更是大幅成長至 349.9 萬份（安田將三、石橋孝太郎，1999 年）。

第三，反對衝突戰爭的「對抗者」（resister）。在一般的情況下，媒體對於決定國家命運的戰爭衝突，會傾向與政府站在同樣立場。但在各個時期，均存在著具理想色彩，反對所有戰爭型態的獨立媒體，會對戰爭進行全面的批判。另一方面，是戰爭無法在短期結束，國內民眾容易出現厭戰情緒；而媒體的戰爭報導也將因為政治上的分裂而出現重大分歧。而此一反映在媒體報導態度的重大分歧，有時會對戰爭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例如，美國在越南戰爭後期逐漸失去持續戰鬥意圖（意志），是因為國內政治出現嚴重的分裂，而當時的媒體角色則是政治分裂的一部分（Hallin, 1989）。

上述媒體在戰爭時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圍繞著戰爭時期媒體的報導立場與態度。對於國家發動戰爭之前的媒體角色，較少有專注對此進行討論的研究。然而，如前所述，驅動國家發動戰爭的原因，是國家／政府對國家利益，以及國家所處的地緣安全風險的認知。而國家利益與地緣風險認知則是一種變動的思維；會因為國家因應國際體系而隨之變動，也會受到國家內部情勢而出現改變，更會受到媒體報導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國家利益與地緣風險考慮下的報導內容、戰略思維，在戰爭爆發之前是一種「想像上的戰爭」。「想像上的戰爭」原本是指武裝衝突之外的思想對峙，包括宗教的、意識型態的對峙。舉例來說，冷戰（cold war）同時涉及地緣政治與意識型態領域的競爭，而由此衍生出的公民社會、政治忠誠、（與大國的）共同體意識，大大左右了冷戰時期亞洲地區的政治、社會、文化語文發展樣貌，可視為一種想像上的戰爭（Sherif, 2013）。

另一方面，在地緣政治論點蔚為潮流的 1930 年代，透過報紙、書籍、廣播等媒體的傳遞，在國家、政府與社會形成「戰爭想像」。換言之，對地緣政治的想像，可視為一種「認知上的戰爭」。從 1930 年代的歷史來看，在

媒體影響與政府決策下，認知上的戰爭最終走向現實上的戰爭。為了進一步釐清媒體在戰爭前與戰爭期間的角色，本研究選擇了 1930 年代的日本歷史進行分析。

參、地緣風險「宣教者」的媒體

一、明治時期日本的地緣構想

明治政府的國家發展，包括對內的國土規劃，以及對外的國家戰略，一開始就受到戰爭與地緣政治的影響。在國內的國土規劃部分，日本最早的鐵路（新橋至橫濱）開業後的第五年（1877 年）發生了西南戰爭。在軍隊、物資運送的需求下，明治政府認識到鐵路運輸的重要性。在政府的宣導下開啟了日本鐵道建設的黃金時期，而此一綿密的鐵道網路，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期間協助運送大量戰略物資至戰場前線（山本弘文編，1986）。

在對外的國家戰略部分，則是重新定位日本在世界的地理位置。對明治初期的日本來說，面對來自亞洲大陸的威脅，朝鮮半島是日本必須掌控的「境外」決戰之地。明治初期由西鄉隆盛（1828-1877）、板垣退助（1837-1919）、江藤新平（1834-1874）、後藤象二郎（1838-1897）、副島種臣（1828-1905）等人主張的「征韓論」，其導火線雖然是朝鮮拒收明治政府的國書，但在明治政府內部的討論過程中，以「大久保意見書」為代表的「經略」概念，逐漸凌駕於原始的「睦鄰」思維之上（吉野誠，2000）。

另一方面，四面環海的日本，也必須以海洋國家的角度思考日本的安全處境。早在明治維新之前，林子平（1738-1793）在其撰寫的《海國兵談》（出版於 1791 年）一書中，就以地理概念描述日本的安全處境如下：從江戶的日本橋到中國乃至於荷蘭，是沒有明確界線的水路。主張必須造船與鑄炮，強化海防來抵禦外敵的侵略（釈悟庵，1908）。明治中期的稻垣滿次郎則是主張，領有臺灣島，以精銳的軍艦在太平洋立足，可掌控南北中國的大權，以及香港、澳洲、巴拿馬、三藩市、溫哥華、日本乃至於上海的太平洋海域的主控權（稻垣滿次郎，1891）。

此外，明治政府也同時受到馬漢的海權論影響，重視海洋軍力的建置與南洋地區的經略。馬漢於 1890 年出版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書，透過海軍省周邊團體「水

交社」的翻譯，在明治政府內部形成一股「建軍制海」（李世暉，2016，頁49）的風潮。在上述地緣認知下，甲午戰爭中獲勝的日本，向戰敗的清朝索取了遼東半島與臺灣。前者是穩定與支配朝鮮半島的重要佈局，發展出日本對大東亞經略的「北進論」；後者則是制海揚威的戰略方針，發展出日本對大東亞經略的「南進論」。

1925 年，盛行于歐美國家的地緣政治研究，在藤澤親雄（1893-1962）、飯本信之（1895-1989）等學者的介紹下正式進入日本。至 1945 年太平洋戰爭結束為止，日本地緣政治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前期 1920 年代，中期的 1930 年代以及後期的 1940 年代（李世暉，2022）。前期的主要活動為西方地緣政治理論的介紹，代表學者為藤澤親雄與飯本信之；中期的主要活動是以亞洲主義分析日本的地緣政治環境，代表學者為小牧實繁。後期的日本地緣政治，則是在海軍中將上田良武擔任會長的「日本地政學協會」³，以及京都地政學派主導下，發展出「新東亞秩序」與「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基礎（參照表 1）。

表 1：戰前與戰時日本地緣政治學的發展

階段	時間	學術活動／學術觀點	代表人物／組織
前期	1920 年代	介紹西方地緣政治理論	藤澤親雄 飯本信之
中期	1930 年代	以亞洲主義分析日本的地緣政治環境	小牧實繁
後期	1940 年代	發展出「新東亞秩序」與「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基礎	日本地政學協會 京都地政學派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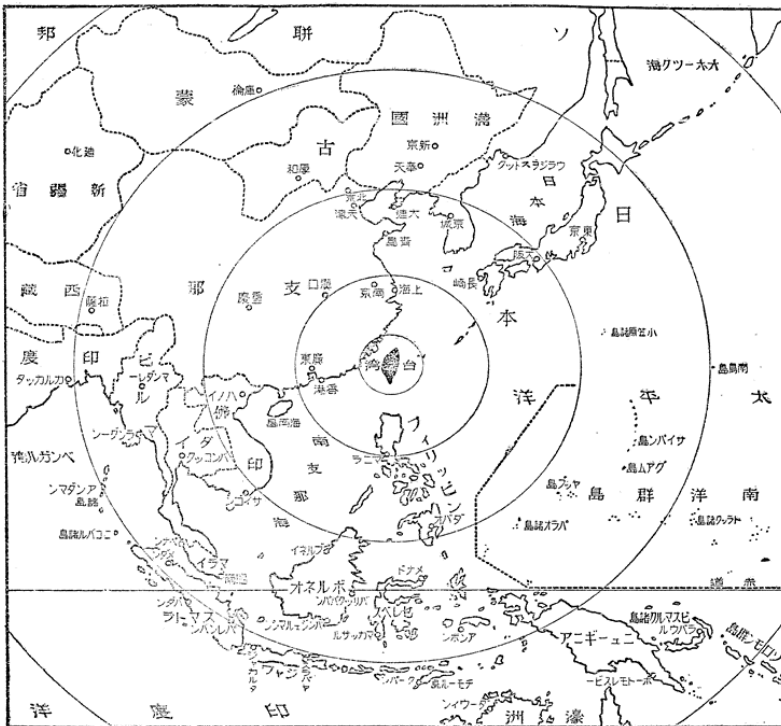
事實上，無論是「北進論」還是「南進論」，當時日本的安全保障思維，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自明治維新、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來，其地緣政治認知下不可分割的歷史連續性。特別是甲午戰爭的勝利，在日本國內形成一股「大日本主義」的社會氛圍。對抱持「大日本主義」的日本領導菁英階層而言，臺灣的獲取決非大日本帝國主義的終點，而是日本國力向西方（中國華南地區）與南方（南洋地區）延伸的墊腳石（李世暉，2016）。與此同時，包括竹越與三郎（1865-1950）的《台灣統治志》（1905 年）、《南國記》

3 上田良武（1878-1957）為鹿兒島縣（薩摩藩）出身的海軍將領，歷任海軍技術研究所航空研究部長、海軍航空本部技術部長，對當時日本航空戰略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

(1910年)，以及島津久賢(1881-1926)的《南洋記》(1915年)、山崎直方(1870-1929)的《我が南洋》(1916年)等與政治書寫、地理調查有關的南進觀點，在媒體出版與報紙報導的推助下，逐漸在日本形成「海國日本」的地緣政治論述主軸。而以臺灣總督府為中心，包括殖民地銀行的臺灣銀行、國策會社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內，也是當時日本南進政策的重要推手(梁華璜，2003)。在《朝日新聞》的報導內容中，臺灣不僅是日本向大東亞擴張的起點，更是大東亞共榮圈的中心(參見圖1)。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面臨到國際情勢急遽變化的1900年代初期，尚未發展出「日本地政學」思維，而是依循地理調查來制定國家戰略。如1901年成立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以及1907年成立的「滿鐵調查部」，乃是透過文獻、實地訪查的方式，調查殖民地(佔領地)的法律制度、交易習慣與風土民情，以利日本在臺灣(進而擴大至華南與南洋)或滿州國(進而擴大至亞洲大陸)的經營。在調查的基礎上宣揚其建構治理典範(如滿州國的「人間樂土」)，也在當時扮演相當之宣教角色。

圖1：臺灣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中心



資料來源：朝日新聞社編(1944，頁2)。

二、地緣論述、媒體與戰爭

1941年11月10日，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包括飯田信之（1895-1989）、江澤讓爾（1907-1975）在內的日本國內知名地理學者、政治學者與經濟學者組成了「日本地政學協會」，並出版了《地政學》（地政学）雜誌。在印刷用紙嚴格管制，絕大多數地理學雜誌被迫休刊的時期，何以日本地政協會得以發行了《地政學》雜誌？從其創刊號明記的「對高度國防國家建設做出貢獻」使命，以及「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地理學」（福嶋依子，1991，頁2）任務，可以一窺其為地緣風險「宣教者」的媒體性質。

透過《地政學》雜誌的出版，以及地政學講習會的舉辦，「日本地政學協會」對於推動日本國內的地緣政治理解與研究，具有相當之影響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當時日本國內戰爭氛圍。雖然「日本地政學協會」是由海軍中將上田良武擔任會長，陸軍大將阿部信行（1875-1953）參與的半官半民組織，但「在實際戰爭、戰略決策上卻不具明顯的影響力」（佐藤由子，1989，頁106）。

除了官方支援色彩明顯的學術組織之外，當時的地緣政治學者也透過媒體的影響力，宣揚日本的地緣政治風險以及戰爭的正當性。其中，最具影響力與代表性的學者為小牧實繁。小牧實繁以京都帝國大學地理學教授的身分，專注地緣政治的研究與發表，一開始就受到日本學界與媒體的關注。小牧實繁在1920年代後期高度評價英國的地理學，讚揚其兼有法國與德國的優點，以及獨自的國家目的，並將英式地理學視為值得效法的物件。當時其主要的思想觀點，是從景觀地理學（Landschaft）的角度，強調應維持固有土地景觀的秩序與調和（柴田陽一，2006年）。

然而，進入1930年代之後，隨著重大國際事件的發生，包括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3年日本退出國際聯盟、1937年的中日戰爭，導致日本面臨到歐美國家的激烈批判。這讓小牧實繁意識到西洋文明的限制，並萌生強烈的東洋意識。在文明認同與愛國主義的結合下，他將固有土地景觀秩序與調和概念，逐漸轉化成堅持「本然之姿」（小牧實繁，1942a，頁108）的地理論述，進而發展出日本地政學的思維。而其所強調的本然之姿，指的是白人侵略之前的世界。這樣的世界擁有自然的住民、風土、文化，也是依循地理與歷史特殊性的神聖世界。

1930年代後期，小牧實繁因學術調查研究的需要，曆訪當時中國的滿洲

地區，以及日本所屬殖民地臺灣等地。並於 1938 年 11 月在《京都帝国大学新聞》發表〈給有志於地理學的人〉（*地理学に志す人へ*）一文後，開始嶄露頭角。之後，小牧實繁陸續透過座談會、演講以及全國規模的廣播訪問，宣導其主張的「日本地政學」（日本地緣政治），以及以東亞為地理場域的「新秩序建設方法論」與「興亞地政學大意」⁴（小牧實繁，1938 年 11 月 5 日）。

1940 年 10 月，小牧實繁將其整理其演講與廣播訪問的主張，出版《日本地政學宣言》一書。本書內容批判歐洲中心主義的傳統地緣政治，強調應建立「符合（日本）國家政策的地理學」、「真實的、清新的實踐學說」（小牧實繁，1940，頁 143）。由於小牧實繁精通歐美的地緣政治理論，瞭解其理論的矛盾與限制；在此基礎上提出以「皇道精神」來打破地理環境限制的日本地緣政治概念，為當時處於國際孤立情勢的日本提供了政策理論上的力量（竹內啟一，1974）⁵。因此，本書出版後立即在日本學術社群與媒體社群引起一陣「日本地緣政治」的討論風潮⁶。1941 年進行了再版、三版與增補訂正版，至 1942 年共發行 5 冊不同的版本。

小牧實繁所主張的日本地緣政治，結合歷史、地理與實踐策略，認為東亞地區與日本具有地緣（多樣化氣候、廣大的稻米生產地等）的優越性，以及區域統合的基礎（如民族與文化的親近），以此建設東亞新秩序是必然的發展趨勢（竹內啟一，1974）。除了在哲學面上要建立符合「皇道精神」的地緣政治理論，作為政策的指導原理之外，也在實際戰略行動上指出，日本最終勢必與「英美舊秩序的勢力」發生戰爭（小牧實繁，1940）；而實踐南方政策（南進論），對美國開戰，是解決日本地緣政治困境的唯一戰略（小牧實繁，1941a）。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爆發太平洋戰爭之後，小牧實繁的論點受到日本媒體的一致讚揚，被視為「結論正確、判斷準確」（柴田陽一，

4 小牧實繁於 1939 年 3 月 15 日，在「興亞座談會」以「新秩序建設方法論」為題進行演講；並於 1939 年 11 月 4 日的「史學研究大會」中，以「興亞地政學大意」為題進行演講。

5 從小牧實繁的思想來看，歐美地緣政治學的矛盾之處在於「捨本逐末」，只求資源物質而捨卻精神文化。他曾指出，東洋的地政學原意，源自於《管子》的「地者，政之本也」，具有經世濟民之義，才是地政學的本質（小牧實繁，1940，頁 185-186）。而追求力量、謀略的西洋地政學，則是必然面臨到發展的限制。

6 例如，山口貞雄（1906-1992，產業地理學史專家）、米倉二郎（1909-2002，東亞地理學者）、淺井得一（1919-2003，人口地理學者）、島之夫（1907-1988，滿州國地理專家）、國松久彌（1903-1986，經濟地理學者）等人，紛紛以專書、媒體書評的方式，稱讚此書的論點。而在此一風潮下，京都大學的日本地政學受到關注，也出現了以研究地緣政治為志向的中國留學生（小牧實繁，1980 年）。

2014，頁 82) 的實踐性觀點⁷。

小牧實繁論點的影響力，主要來自於兩個部分。第一，透過「吉田會」與當時的軍部建立合作關係。吉田會成立於 1939 年，是以京都帝國大學地理學教室的小牧實繁教授、室賀信夫（1907-1982）副教授為核心的研究會，也被視為京都地政學派的根據地。吉田會成員包括別枝篤彥（1908-1997，東南亞）、淺井得一（1919-2003，南亞）、米倉二郎（中國）、野間三郎（1912-1991，歐洲）、三上正利（西伯利亞）、朝永陽二郎（非洲）等地緣與地理專家。在軍部周邊團體「皇戰會」的支持下，吉田會每週開會一次，進行各國地理重要性的分析。而這些發表結果，則是透過「皇戰會」對日本的軍事戰略產生直接影響⁸。

當時，包括綜合地理研究會（吉田會）、世界歷史研究會、戰爭研究會等學術組織，都受到皇戰會的資金支持。其中，世界歷史研究會進一步籌辦名為「蘇美學塾」的思想教育團體，大規模舉辦講習會（共計 7,500 人參加）並出版相關書籍，在當時具有相當之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參與「蘇美學塾」講習者多為大學生、官僚、新聞記者、醫生、社團領導人等社會精英；而其使用的教材中與地理有關之論述，多來自吉田會的主張（柴田陽一，2006）。換言之，在皇戰會資金支持與組織網絡下，吉田會的研究成果獲得當時日本社會精英的理解與關注。

舉例來說，吉田會於 1940 年 12 月完成「新加坡論」，主張不應過度誇大新加坡的軍港價值，但也不應貶抑其政治價值。這是因為，新加坡缺乏重工業的基礎，並不具備一個重要軍港的條件。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可視為牽制英國在東亞勢力的軍事進攻選項。由此，「新加坡論」主張透過下列三項陸軍方略來佔領新加坡。分別是陸軍進駐中南半島，與泰國簽訂軍事協定，以及以雲南作戰牽制英國軍隊（室賀信夫，2001）。在此一地緣思維的指導下，日本陸軍山下奉文大將制定「馬來戰略」，於 1942 年 2 月成功取得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控制權（村上次男，1999）。

第二，透過當時主流媒體的宣傳。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小牧實繁獲得日本各媒體的邀請撰寫文章，其日本地緣政治論點快速地傳播至日本的政治、

7 依據小牧實繁的論點，歐美以強權主義在亞洲建立的舊秩序，隨著文化的多元展開，必然受到追求本然姿態的東亞新秩序挑戰。由此，由日本地政學宣導的「世界維新、亞洲復古」（小牧實繁，1941b，頁 4）新秩序，勢必與西方地緣政治建立以壓榨亞洲為目的舊秩序產生衝突，進而發生戰爭。而此一論點，也被《週刊朝日》、《朝日新聞》、《京都新聞》等全國與地方媒體轉載。

8 皇戰會是由日本陸軍將領高嶋辰彥（1897-1978）於 1939 年成立的組織，與參謀本部有著密切的關聯。其工作項目之一，即是以資金支持小牧實繁等人的地緣政治研究。

經濟與社會各領域。如表 2 所示，小牧實繁在戰前的出版活動（1938 年至 1945 年），不到 8 年的時間，共有 165 篇的雜誌、報紙評論與專書篇章。此一期間小牧實繁的著作活動有三大特點：第一，有 96% 的文章是在 1941 年至 1945 年間撰寫；第二，接近四成的文章是透過報紙進行傳播；第三，論點發表的媒體相對多元。值得注意的是，1942 年 12 月，小牧實繁參與「大日本言論報國會」⁹ 的成立，並擔任理事，進一步強化其對當時日本地緣戰略論述的影響力。

表 2：小牧實繁的著作刊載媒體（1938 年至 1945 年）

雜誌／報紙	篇數
大阪新聞	15
古事記研究（革新國策綜合雜誌）	8
週刊朝日	8
京都新聞	8
現代	6
政界往來	6
朝日新聞	6
國民評論	5
東京新聞	5
新天地	4
大阪每日新聞	4
地理論叢	3
公論	3
改造	3
大洋	3
京都帝國大學新聞	3
日本讀書新聞	3
文藝世紀	2
讀書新聞	2
中外商業新報	2
農大新聞	2
中外日報	2
其他雜誌	37
其他報紙	13
單行本收錄論文	12
合計	165

資料來源：參酌柴田陽一（2014，頁 83-84），作者自行整理。

註：底線黑字的媒體為報紙。

在政府的支持與媒體的配合下，小牧實繁將其對國際形勢、日本地緣風險的認知，轉化成日本社會認識國家現況的哲學基礎，以及日本政府制定與推動國家戰略的指導原則，包括回歸共同體的本然之姿、建立天皇信仰的地

9 大日本言論報國會是由情報局第五部第三課（文化部文藝課）主導設立，網羅了主要的學者、專家與媒體評論家，是戰爭時期唯一的政治社會評論組織。

政學等。此外，當時的日本放送協會（Nippon Hōsō Kyōkai，簡稱 NHK；英文則為 Jap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也特別將小牧實繁的演講內容與其日本地緣政治主張，透過海外廣播頻道制播「地政學上的大東亞」節目向美國、中國重慶放送。美國的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雜誌（1942 年 12 月）以及 Asia and the Americas 雜誌（1943 年 6 月），翻譯並刊載了小牧實繁演講的 6 次廣播內容，並將其視為太平洋戰爭中最能反映日本戰略的文件（Stephan, 1984）。由此可以看出，小牧實繁的日本地緣政治論點，不僅在日本國內形成風潮，也受到美國的關注（Fifield & Percy, 1944）。

1930 年代後期至 1940 年代中期，是日本發動與推展太平洋戰爭的時期。京都地政學派的代表人物小牧實繁，在媒體的支持下成功地宣揚其「日本地緣政治」思想。而此一日本地緣政治，包括了日本國家與國民的世界觀、大東亞建設的戰略，以及日本的精神。除了大東亞戰略涉及建立南方農業經濟、推行地理教育等政策措施之外，日本國家與國民的世界觀以及日本的精神，均與思想、宣教有關。例如，在國家的世界觀上，小牧實繁強調，必須揚棄歐美國家宣揚的「自然之姿」（景觀自然地理），重新還原亞洲的「本然之姿」（文化歷史地理）。而在國民的世界觀上則認為，歐美國家的地緣政治是扭曲的、侵略的世界觀，有必要回歸亞洲農業社會基礎的命運共同體，以正確的地緣政治世界觀啟蒙國民（小牧實繁，1942b）。而在日本的精神上，小牧實繁主張，透過淨明正直的大和心，以必勝的信念祈禱，必能帶來戰爭的勝利（小牧實繁，1944 年 7 月 21 日）。換句話說，此一時期傳達小牧實繁地緣思想的日本媒體，可視為是地緣風險的「宣教者」（missionary）。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簡稱 GHQ）於 10 月進駐京都大學地理學教室，要求小牧實繁重新寫出（reproduce）其為日本政府進行的軍事地理研究成果。但小牧實繁以「無相關資料」為由加以拒絕（正井泰夫、竹內啟一，1999）。同年 12 月 27 日，小牧實繁在清算戰爭責任的社會氛圍下被迫離開京都大學。直到冷戰地緣政治成形後的 1952 年，才重新以滋賀大學教授身分重返學界。重返學界的小牧實繁不再進行地緣政治的研究，而是專注滋賀縣周邊的地理與人文風土調查。然而，由其開創的「日本地政學」研究方向並未完全消失，而是由京都大學地理學的同事、學生所發起的「人文地理學會」所承繼。即便是對小牧實繁進行過嚴厲批判的美國，也於 1970 年代開始正視小牧實繁

的地緣政治思想¹⁰。而小牧實繁也在 1980 年著文表示，今後更將「努力於確立日本地政學」（小牧實繁，1980，頁 17）。

肆、結論

總的來說，媒體與戰爭的關係可以從戰前、戰時與戰後等不同階段進行觀察。而媒體在戰爭上扮演的角色，也可細分為資訊控制下的「唱和者」、愛國主義下的「啦啦隊」、反對衝突戰爭的「對抗者」以及地緣風險的「宣教者」等四類。在此必須強調的是，本論文所研究的媒體宣教者角色，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已逐漸成為思考媒體與戰爭關係最重要的切入點。這是因為，國家／政府對於國家利益與地緣政治的世界觀思考，比起認知他者的國家利益，傾向認知自我的地緣風險。事實上，小牧實繁在 1930 年代後期至 1940 年代中期，透過日本媒體所宣揚的日本地緣政治，就是一種確認自我認同的世界觀，而非理解他者的世界觀（柴田陽一，2014）。

在此一思維模式下，當媒體面臨到戰爭的情境時所宣教的內容，不外乎國際政治經濟現勢（世界觀）、國家處境（地緣風險）與國家目標（國家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扮演宣教者的媒體，特別是影響力較大的大眾媒體，其宣揚地緣風險的目的，有的是為了引起讀者關注者，有的是自詡為新知識的仲介者。有的時候，媒體的本意雖非鼓動戰爭，但卻會成為戰爭推進、擴大的工具（如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當然，有的時候也會因為媒體的批判與反抗，戰爭才得以避免或提早結束（如越南戰爭時的美國）。

地緣政治的思維，從 1930 年代至今，實質內容已出現許多改變。例如，從強調軍事安全的地緣政治，發展出重視經貿與科技安全的地緣經濟。另一方面，媒體的類型與運作方式，也從 1930 年代的報紙、雜誌、廣播為主，發展出目前的網路、電視為主。有一點不變的是，即便在戰爭頻率較低的現代國際社會，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興媒體，依舊扮演著地緣風險「宣教者」的角色。過去幾年經常被國際媒體提及的「地緣風險」之一，就是臺灣。

例如，日本在 2020 年 4 月的美日首腦會談中，強調臺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並將其載入《防衛白書》之中。之後透過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

10 例如，1975 年，一名日裔美籍的博士生 Russell Nozomi Horiuchi，於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提出題為“Chiseigaku”: Japanese Geopolitics 的博士論文，內文大量引用小牧實繁的觀點，經審查通過後取得博士學位。

晉三的媒體談話，進而發展出「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論點。而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簡稱 CFR）於 2021 年 1 月，發佈了「預防優先次序調查」（preventive priorities survey），將臺灣海峽危機列為影響美國利益的第一級風險。中國則是在 2022 年 9 月之後，透過政府談話與官媒報導，強調「臺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臺灣海峽危機是影響美國利益的第一級風險」以及「臺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等地緣風險，經過各種媒體無時差的宣傳報導，在國際社會的認知上，無異推升了臺灣海峽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最具代表的例子，就是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多次以封面報導的方式，將臺灣視為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以及國際社會如何「為臺灣而戰」。之後，隨著美國與中國的競爭態勢加劇，全球的主要媒體都將臺灣海峽視為可能發生戰爭的區域。

透過媒體的報導，臺灣海峽的地緣風險正如上升氣旋般地席捲了國際社會。圍繞著臺灣問題的主要行為者，在接受了各種地緣風險訊息後，已然形成了「認知上的戰爭」。在可預見的未來，此一認知上的戰爭是否會走向真正的戰爭，除了繫於周邊重要國家領導者的決策思維之外，媒體的唱和者、啦啦隊、對抗者、宣教者角色，其影響力也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 王明珂 (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允晨文化。
- 李世暉 (2016)。《日本國家安全的經濟視角：經濟安全保障的觀點》。五南圖書。
- _____ (2017)。〈台日關係中「國家利益」之探索：海洋國家間的互動與挑戰〉，《遠景基金會季刊》，18(3)：1-40。
- _____ (2022)。〈日本海洋安全保障的地緣思維：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交錯〉，蘇嘉宏（主編），《日本新安保法制與海洋政策研析》，頁 19-50。國家海洋研究院。
- 梁華璜 (2003)。《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導論》。稻鄉出版。
- Anderson, B.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Verso.
- Clausewitz, C. von (1976). *On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ifield, R. H., & Percy, G. E. (1944). *Geopolitics in Principle and Practice*. Ginn & Company.
- Hallin, D. C. (1989). *The uncensored war: The media and Vietn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ueller, J. E. (1973). *War, presidents and public opinion*. John Wiley & Son.
- Stephan, J. J. (1984). *Hawaii under the rising sun: Japan's plans for conquest after Pearl Harbor*.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Thussu, D. K. & Freedman, D. (2003). *War and the media*. Sage Publications.
- Wyatt, C. R. (1995). *Paper soldiers: The American press and the Vietnam wa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herif, A. (2013)。〈想像上の戦争：文化にとって冷戦とは何か〉，《アジア社会文化研究》，14：49-63。
- 小牧実繁 (1938 年 11 月 5 日)。〈地理学に志す人へ〉，《京都帝国大学新聞》，5 版。
- _____ (1940)。《日本地政学宣言》。弘文堂书房。
- _____ (1941a)。〈南方政策の確立〉，《日本教育》，1(1)：11-14。
- _____ (1941b)。〈「大東亜戦争」宣言〉，《周刊朝日》，12 月 28 日号：4-5。
- _____ (1942a)。《地政学上より見たる大東亜》。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 _____ (1942b)。〈大東亜必勝の強味—日本地政学より観たる大東亜共栄圏〉，《大陸科学》，1(4)：14-19。
- _____ (1944年7月21日)。〈いま起たざれば!〉，《毎日新聞》，4版。
- _____ (1980)。〈戦前，战中，戦後〉，《湖国と文化》，12：16-17。
- 上野貴史 (2016)。〈ロマンス語語彙におけるゲルマン語の通時的影響：10世紀までのロマンス語語彙と古英語〉，《広島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論集》，76：17-40。
- 山本弘文編 (1986)。《交通・運輸の発達と技術革新—歴史的考察》。东京大学出版会。
- 山崎直方 (1916)。《我が南洋》。広文堂書店。
- 田中明彦 (1997)。《安全保障：戦後50年の模索》。読売新聞社。
- 正井泰夫、竹内启一編 (1999)。《続・地理学を学ぶ》。古今书院。
- 竹内启一 (1974)。〈日本におけるゲオポリティクと地理学〉，《一橋論叢》，72(2)：169-191。
- 竹越与三郎 (1905)。《台湾統治志》。博文館。
- _____ (1910)。《南國記》。二酉社。
- 安田将三、石橋孝太郎 (1999)。《朝日新聞の戦争責任》。太田出版。
- 吉野誠 (2000)。〈明治6年の征韓論争〉，《東海大学紀要—文学部》，73：1-18。
- 西川長夫 (2002)。《戦争の世紀を超えて》。平凡社。
- 村上次男 (1999)。〈日本地政学の末路〉，《空間・社会・地理思想》，4：50-56。
- 佐藤由子 (1989)。〈飯本信之が語った地政学〉，《地理》，34(10)：105-107。
- 佐藤卓己 (2022)。〈戦争報道のメディア論〉，《メディア展望》，731：1-11。
- 室賀信夫 (2001)。〈シンガポールの軍事地理的考察〉，《空間・社会・地理思想》，6：98-106。
- 高坂正堯 (1991)。〈冷戦後の新世界秩序と日本の『貢献』〉，《国際問題》，379：2-16。
- 島津久賢 (1915)。《南洋記》。春陽堂。
- 柴田陽一 (2006)。〈小牧実繁の「日本地政学」とその思想的確立：個人史的側面に注目して〉，《人文地理》，58(1)：1-19。

- (2014)。〈思想戦と「日本地政学」：小牧実繁のプロパガンダ活動の展開とその社会的影響〉，《人文學報》，105：69-116。
- 稻悟庵 (1908)。《林子平言行录》。内外出版协会。
- 喜多悦子 (2005)。《紛争時、紛争後におけるメンタル・ヘルスの役割》。独立行政法人国際協力機構国際協力総合研修所。
- 朝日新聞社編 (1944)。《南方の據點・台湾：写真報道》。朝日新聞社。
- 稻垣満次郎 (1891)。《東方策 第1編・第2編》。活世界社。
- 福嶋依子 (1991)。〈地理学の方法論的反省と地政学〉，《お茶の水地理》，32：1-8。
- 藤田博司 (2004)。〈戦争報道とメディアの役割：ジャーナリズム論の視点から〉，《国際安全保障》，32(3)：109-130。
- 藤沢親雄 (1925)。〈ルドルフ・チェーレンの国家に関する学説〉，《国際法外交雑誌》，24(2)：49-69。

本文引用格式

- 李世暉 (2023)。〈地緣風險的認知作戰：論媒體的宣教者角色〉，《傳播研究與實踐》，13 (2)：9-28。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2
- Li, S. H. (2023). Cognitive warfare of geo-risk: On the media's role as a missiona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9-28.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2 [Text in Chinese]

Cognitive Warfare of Geo-Risk: On the Media's Role as a Missionary

LI, Shui-Hui*

Professor, Program in Jap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perception of security risks in geopolitics by countries and governments determines whether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countries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peace or war. In the current cognitive warfare of geo-risk, the medi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eneral, the roles of the media in war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sympathizer” under information control, “the rooter” under patriotism, and “the resister” against conflict and wa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geopolitical thinking of Saneshige Komaki, who was an advocate of Japanese geopolitics from the mid-1930s to the mid-1940s, and discusses its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how it interacted with the media, and the impact it brough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hen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and war, the media also plays the role of “the missionary” of geo-risk. The role of the media as a missionary is to promote national interests through geopolitics,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people's worldview and the country's perception of war.

Keywords: Saneshige KOMAKI, Japan, geopolitics, media and war

* E-mail: riseiki@gmail.com

Received: 2023.03.27; Accepted: 2023.05.01